

# 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

## ——以港台地区为例

张 建 包玉婷\*

**摘 要：**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国家统一是题中应有之义，反分裂也成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反分裂斗争中，国家认同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层面。政治意识属于政治认同的范畴，是影响政治认同的重要变量；在文化认同层面，国家主体文化和亚国家文化的融合发展则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政治意识的对立和主体文化认同的缺失共同导致了部分香港民众和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台独”和“港独”势力通过构建政治意识上的对立、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割裂两地历史联系和反对融合发展以弱化甚至颠覆国家认同。基于此，中央政府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展现制度优越性，加强制度认同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地方本土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凝聚价值共识，增强国家文化认同建设。

**关键词：**反分裂；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港独”；“台独”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1)01-0037-11

**DOI:**10.13818/j.cnki.twyj.2021.01.004

### 一、问题的提出

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必须重视的重大政治和安全课题。当今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中央地方关系都各不相同，但是在涉及维护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各国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反对国家分裂已成为普遍性的国际法准则，这就为国家的反分裂斗争提供了国际法基础。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关键期，国家统一是其必然要求，反分裂也因此成为了新时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就反对国家分裂，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作出重要的指示。在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一国两制”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港澳台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深入推进，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成为了新的增长动力。大陆和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有力维护了台海和平稳定。由此可见，反分裂斗争需要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既要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后盾，也要建构起坚定的国家认同。

\* 作者简介：张建，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包玉婷，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两权有机结合与依法共生理论与实施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8BZZ117）。

国家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主要表现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认同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持续凸显,分裂势力也正是通过弱化民众的国家认同来实现分裂国家的图谋。因此,国家认同的建构也成为政治学界广为关注的问题,形成了许多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一,在国家认同的相关概念及影响因素方面,李捷从价值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反分裂斗争中的认同政治,认为在反分裂斗争中,价值观是关键变量,其与合法性和政治认同息息相关,价值观对立的建构也由此成为了分裂势力采取的重要手段。<sup>[1]</sup>与此同时也对国家统一过程中文化认同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文化认同是群体建立和维系的内核,国家与其域内的族群、地域等群体在文化认同中呈现“一体多元”的面貌,而分裂势力正是通过在文化层面上消解国家文化认同来挑战国家统一。<sup>[2]</sup>林尚立则认为国家认同是关乎国家建设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sup>[3]</sup>曹伟指出,当国家认同开始弱化时,中国的分裂主义就得以出现并以族群民族主义为工具,来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故而反分裂的治本之策是通过强化中华民族认同进而强化国家认同。<sup>[4]</sup>第二,在有关港澳台等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方面,石勇选取了“领土认同”、“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三项指标来衡量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情况,得出两岸在民族文化认同上基本契合,但在领土认同和制度认同上却存在裂痕的结论。<sup>[5]</sup>曾志敏、宁悦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了香港新生代青年对内地的社会心理及心理动机的发展变化,认为殖民统治的影响、国民教育的缺失和内地的学习生活体验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sup>[6]</sup>王晓笛在对比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的基础上,认为根本上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在两地的程度差异所导致的认同的差异,由此反映了中央与港澳特区之间管治机制联结程度的差异。<sup>[7]</sup>

上述研究对国家认同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分别给出了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以及分裂主义通过何种方式来消解国家认同,同时也针对具体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进行了探讨,但大多是从政治认同或者文化认同的单一视角去探究国家认同的建构。基于此,本文旨在从反分裂的视角出发,以香港和台湾地区为例,分别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层面探究是什么因素对两地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影响?“港独”和“台独”等分裂势力又是如何影响国家认同建构的?并就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建设给出些许建议。

## 二、反分裂斗争中认同建构的影响因素

国家认同一般可分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方面,两者共同构建了民众对作为政治共同体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在政治认同层面,本文将政治意识视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文化认同层面,国家主体文化和亚国家文化是否能融合发展以凝聚文化共识也会对国家认同的构建产生影响。

### (一) 政治认同层面

政治意识是一定的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它是在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政治意识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为。<sup>[8]</sup>因此,政治意识直接影响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的危机从根本上来看是相应的政治意识认同的缺失所导致的。政治认同是对政治体系的认同,而政治体系是指政治行为体所赖以存在的制度形式,是政治行为主体与政治制度的有机统一。<sup>[9]</sup>政治体系的认同危机既包括对制度的认同危机,也包括对国家和政府权威的认同危机,国家、民族的自豪感和政府的信用度随之下降甚至不复存在。<sup>[10]</sup>而这种认同危机一旦产生,政治认同主体就开始对

政治体系主导的价值和原则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在行动上则多表现为不予合作、反对甚至上升为直接的对抗。<sup>[11]</sup>换言之，政治意识方面认同的缺失会造成行为主体对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共同体认同的缺失，由此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和对抗行为，进一步弱化政治认同。在香港和台湾地区，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将西方民主制度视为真正的民主，把定期的、多党的竞争性选举视为民主制度的衡量指标，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抵触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反映了国家制度层面上的认同缺失。

除此之外，政治意识的代际转换也在不断的消解政治认同。就台湾地区而言，老一辈的台湾民众由于同大陆的渊源，政治意识也很大程度上同过去的生活经历相关，对大陆存有很深的认同和感情，但是随着代际的更替，基于在大陆的生活过程中而形成的政治意识逐渐消散，更多的是已经“本土化”的政治意识。自1949年两岸分离以来，大陆和台湾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恋，加上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反共”的意识形态塑造，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恐惧和厌恶的心理认知，对大陆极度缺乏了解且存在偏见，由此造成了对大陆的政治认同也在不断的弱化甚至消散。同时，政治意识的代际更替也更多反映在青年一代身上。英格尔哈特研究了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政治意识层面的变革，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反映了人们的关注由物质满足、安全价值向归属感、自我表达、生活质量转变。<sup>[12]</sup>当今时代下的台湾青年也更加注重对个人自由，自我表达等方面的追求，否定传统的政治权威，极易受到内外部势力的煽动，对国家的反分裂斗争和国家统一进程造成负面影响。

## （二）文化认同层面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共同面临着文化认同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对国家主体文化认同和对地域亚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大部分多民族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例外。中国是由以汉族为主体与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加上广大的领土范围，国家内部难以避免多元性的文化认同，因此促使个人或群体在认同本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同时凝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关涉国家稳定的重要努力。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语言以及所处地域的不同，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会形成多种围绕自己族群或者地域的文化认同，因此国家内部文化认同的多元化成为了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此种情况就需要把握好对本民族或地域文化认同和对主体文化认同的主次关系，当对亚文化的认同过高，但是却并没有形成主体文化共识，就会给国家的长期稳定造成隐患，甚至出现分离主义的倾向，也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利用从而威胁本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但是完全抛弃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性，要求绝对的文化统一是不现实的，同时由于长期共存于同一国家内部，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政治实体的同时也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能与其他文化共存。正如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sup>[13]</sup>“多元”是指民族来源的多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不管来源如何，经济、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异，都认同为一个民族。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家统一一依靠于政治认同，而非文化认同，但是丧失文化认同的维系，政治共同体也必然缺乏活力和思想支撑，由此可见多元一体实质上是文化上的多元，政治上的一体。<sup>[14]</sup>因此，构建国家文化认同的关键是国家主体文化和亚国家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地的民众经过在当地长期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对当地的自



然环境、政治制度以及生活习惯都产生了心理上的惯性依赖，特别是台湾地区同大陆在地缘上隔台湾海峡相望，加之历史原因造成的两地长期联系中断，港台地区民众开始更加的强调中华文化在当地的发展，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更为强烈，并且随着本土主义思潮的极端化，甚至出现了否认中华民族的激进论调；与此同时，世代的不断更替也使得人口的本土化难以改变，青年一代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更多来自于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而对中国的革命文化和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排斥。加之，香港和台湾地区由于英国和日本的长期殖民统治在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之后基本沿袭了英国和日本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两地青年缺乏对历史问题准确清晰的认识甚至存在错误的认知，并且表现出对亲英、亲日的情感倾向，反映了港台两地的民众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缺失，其文化认同缺乏中心传统和家国情怀，具有外围叙事的特点。

### 三、分裂主义影响认同建设的具体手段

分裂主义是国际社会一种相对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它伴生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又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不断演进。<sup>[15]</sup>近年来，分裂主义再次抬头，这波逆流是在各种条件刺激下国家文化及政治认同危机的集中体现，为此世界各国都需要提高警惕并防患于未然。对于中国而言，“台独”和“港独”势力通过构建政治意识上的差异与对立、文化上的“去中国化”、企图割裂香港和内地、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反对和阻止融合发展来弱化甚至颠覆民众的国家认同，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了挑战。

#### （一）建构政治意识的差异和对立

“港独”和“台独”分裂势力在政治认同层面主要通过建构港台地区同内地的政治意识上的差异和对立，以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为政治基础，集中表现为制度认同的对立。

“港独”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全盘否定和敌视的态度，将其等同于专制制度的代表，通过制造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来歪曲部分香港人，特别是青年群体对香港的定义与归属的立场。2019年6月，香港修改《逃犯条例》风波，进一步表现为香港民众对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并由此爆发了街头暴力示威，而这一事件正是青年学生充当了暴力的主力，成为了“港独”势力实现政治图谋的牺牲品。同时，香港回归后，由于受到长期殖民统治的影响，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政治共识也未牢固的建立起来，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被激进势力极端夸大，由此弱化了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此外，激进势力也极端反对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并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作为其行为合法化的合理依据。由此可见，香港近年来问题频发甚至走向暴力化，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香港部分民众对国家制度认同的缺失。

在台湾地区，蔡英文主政以来，岛内的“台独”势力越发猖獗，对台海地区安全造成了威胁，两岸的政治互信进一步降低，对两岸之间的交流也产生负面影响。“台独”势力在将“台湾意识”和“台湾独立”等同起来，将大陆塑造成为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对立面，夸大大陆政治制度模式的弊端，但却将台湾的制度视为圭臬。同时，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先后提出了“两国论”和“一

边一国论”，进一步塑造“台湾主体意识”，且控制媒体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方针政策进行歪曲和抹黑。由此可见，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知一直被“台独”势力所裹挟，是不准确的、片面的甚至经过渲染丑化的。加之近年来大陆的迅速发展，扭转了之前“台强陆弱”的局面，而岛内失业率高居不下，在“台独”舆论和台湾当局的操纵下，台湾民众的心理落差加大，并将对台湾经济和自身的发展的忧虑转变为对大陆的敌视，真正去了解大陆的意愿不断降低。

## （二）塑造“去中国化”的文化认同

除了在制度层面制造对立以外，“港独”和“台独”势力为了弱化民族文化认同的目的，竭力推动“去中国化”，力图切断本土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联系，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窄化为对内地和大陆的认同，把本土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区分开来，制造文化上的分裂。

近年来，本土意识在香港日渐兴起，并随之出现了诉诸本土意识和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运动，香港本土主义成为了“港独”重要的思想基础且日益极端化。由于英国长时间殖民统治的影响和遗绪，后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形成了带有明显外来因素且本土化的文化认同，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自非法“占中”到2019年8月香港多次爆发的暴力乱港事件，显示出香港本土主义已与分离主义相互交融。<sup>[16]</sup>“香港民族论”正是其表现之一，强调“香港公民”的身份，否认中华民族，通过“去民族化”来割裂两地的文化联系，冲击民众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同时，“港独”分子陈云的《香港城邦论》更是开启文化政治化的道路，以达到重塑港人身份认同的目的。他将香港的历史视为“城邦历史”，并提出要继承往昔英治时期的优良传统以弥补英治后期的匮乏，以建立中西文化糅合的香港本土文化来确保香港的城邦地位。<sup>[17]</sup>由此可见，激进的香港本土主义在强调对香港本土文化认同的同时，又在文化上力图塑造“去中国化”。

“台独”势力则是努力将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割裂开，同时区别国家认同和对大陆的认同，增强“台湾主体意识”，对台湾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表现出极度的优越感，而对大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持偏见甚至将其视为束缚。20世纪80年代起，“台独”学者就竭力构筑“台湾民族论”，否认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史明作为“台湾民族论”的鼓吹者认为，台湾人不是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汉人、高山族人，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此台湾人不是中国人，<sup>[18]</sup>为之后的“台独史观”构建了思想基础。新世纪以来，民进党和绿营人士强调以“台湾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以“台湾民族”取代中华民族，<sup>[19]</sup>并不断地攻讦和妖魔化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企图切断二者之间的关联以影响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从而使其难以形成本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价值共识，最终实现分裂大陆与台湾的图谋。

## （三）割裂两地历史联系

“港独”和“台独”势力推进认同政治建构的过程中，美化殖民统治的历史，灌输被歪曲且具有“独立”意识的史实，构建起两地民众以本土为主体的历史观，割裂香港和内地、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实现分裂主义的目的。

“港独”分裂势力利用殖民主义有目的地制造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隔阂，消解原有价值观念，形塑“恋殖”的心理情结。将香港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都归功于英国殖民的历史传统，割断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依靠的历史事实，并且将香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归罪于内地发展对其的负面影响，促使香港本土主义越发的极端化，进一步排斥与内地的政治、文化认同，最终实现香

港的“完全自治”，其诉求远远超过了“一国两制”所给予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限度。与此同时，港英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对香港推行的管制，即行政吸纳政治，将香港地区的各界精英群体吸纳进了西方的价值体系之中，这些人对英国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而且教育上采用英国的教育体制，并使用英语教学，实行“无历史”的教育，淡化了香港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记忆，使其对殖民历史也不甚了解，否认中华民族在反对殖民统治，获得民族解放方面所取得成就。正如强世功教授所指行政吸纳政治的真正意涵并非是单纯的精英整合，而是“港英殖民统治在残酷镇压了那些希望当家作主而不服从殖民支配的反殖民主义者后，将那些甘心或着违心接受殖民统治的精英或草根下层整合到殖民体制中”。<sup>[20]</sup>

在台湾地区，“台独史观”经过几十年的建构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岛内民众的国家认同，成为“台独”势力加强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基础。“台独史观”为了实现分裂大陆和台湾的目的，从历史上把中国和台湾割裂开。20世纪80年代，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在台湾传播开来后，使得岛内具有“台独”思想的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建构“台独史观”。郑钦仁作为当时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台湾史的研究不能受限于中国史的观点，唯有以世界史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过去与未来所扮演的角色，摸索出台湾自立生存之道，摆脱周围强权的纠葛”，<sup>[21]</sup>强调要形成台湾自身的“历史意识”。<sup>[22]</sup>9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开始对历史教科书进行编写和修订，意图建构台湾青少年的“台独史观”。1995年李登辉主导下的《认识台湾》教科书第一次将台湾史从本国史中独立出来，在强调“台湾人主体”的同时，肯定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发展建设的“推动作用”。陈水扁上台后，进一步推进“台独史观”，新的历史课纲开始将台湾史彻底与中国史割裂，主张“台湾史即国史”。马英九主政后期，提出对高中历史进行拨乱反正的“课纲微调”，但遭到民进党反对，并动员青年走上街头发动了“反课纲运动”，最终以蔡英文上台废止“微调”告终，显示出“台独史观”已经在岛内历史课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随后，蔡英文在岛内继续推行更加彻底的“去中国化”，教育方面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加入“台独意识”，将台湾“国家化”，使得青年群体对于日本殖民统治、两岸分离的历史缺乏认识，否定国家统一的价值，进一步割裂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

#### （四）反对两地融合发展

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给予台湾同胞同等发展机遇，实现两地与大陆的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反分裂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港独”和“台独”分裂势力竭力制造“自我”和“他者”的身份界限，强调差异认知，利用这种二元对立阻止两地融合发展。

港英政府的行政吸纳政治使得当局对香港的统治呈现出一元化的倾向，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在此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将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经制度，快速而又原封不动地接收下来，然后再因时机予以调整。<sup>[23]</sup>但港英当局留下的民主化尾巴给回归后中央与香港的管治融合带来困难，至今香港的政治团体依旧按照支持中央及特区政府与否分为建制派和泛民派两大政治派别。而中央与香港管治融合的脆弱性就必然影响香港社会的国家认同，引发了回归后“反二十三条立法”、“占中”和“反修例”等反对中央对香港实施管治的非法运动，助长了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加之近年来内地发展迅速，香港与其原有的差距缩小，香港激进分子利用港人内心的迷思和不安促使本土意识走向极端化，不断地抹黑中央政府、侮辱国旗，将香港和内地归结为“自我”和“他者”，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份不但阻滞两地融合发展，更导致以青年为代表的香港民众发动和参与“乱港暴动”，对



香港的繁荣稳定造成消极影响。香港社会的政治化使得内地对香港的好感度下降，两地情感互动受阻，强化了香港和内地的差异和对立，深刻地影响了两地的经贸往来，阻滞了香港和内地融合发展的进程。

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后，蔡英文再度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长达8年的连续执政局面被确定下来，这也势必影响两岸关系的走向。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两岸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民进党借香港“反修例风波”公然营造“台独”、“港独”合流的气氛，并提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荒谬口号，恐吓民众，抹黑和丑化“一国两制”，加剧了两岸的对立。同时，“台独”舆论制造出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了台湾岛内失业率上升、冲击台湾本土产业的论调，使台湾民众怀疑大陆的意图，担心岛内经济过度依赖于大陆的发展，这些都为两岸的融合发展设置了障碍。政治基础的薄弱必然会影响两岸的社会经贸往来。根据台湾观光局的数据（如图1），自2016年蔡英文执政以来，大陆居民赴台游客急剧下降，相较于2015年减少了67.2万人次。2019年8月起大陆暂停了赴台自由行个人签注，台湾当局也拒绝核准春节航班加班机计划，两岸人员流动受到限制。2020年初，台湾方面“反渗透法”的正式出台以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两岸人员交流蒙上阴影。<sup>[25]</sup>由图2可知，2020年前五个月大陆赴台游客仅为9.9万人次，仅占所有赴台游客的8%，低于任一“其他类”游客。可见，两岸局势对两岸能否走向融合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并不会放弃其“渐进台独”的道路，因此，台湾和大陆的融合发展也将面临重重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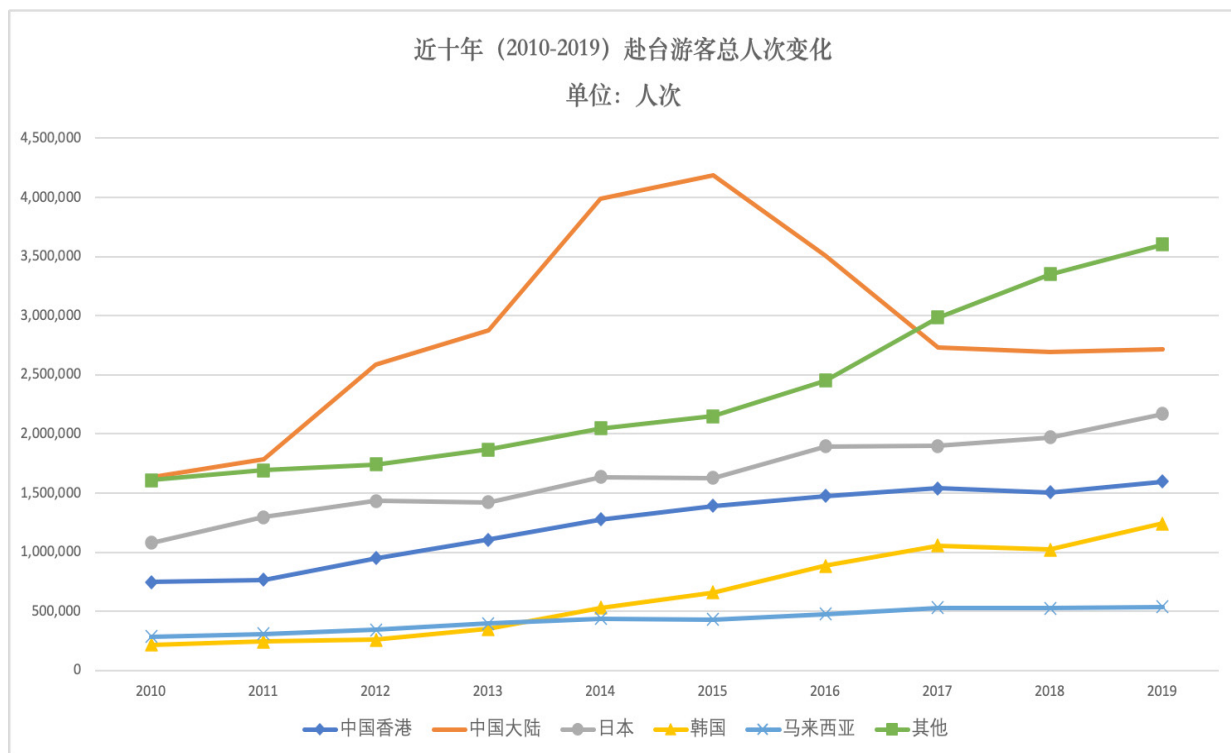


图1 近十年（2010-2019）赴台游客总人次变化

数据来源：台湾交通主管部门观光局观光统计资料库 <https://stat.taiwan.net.tw>，访问时间：2020年7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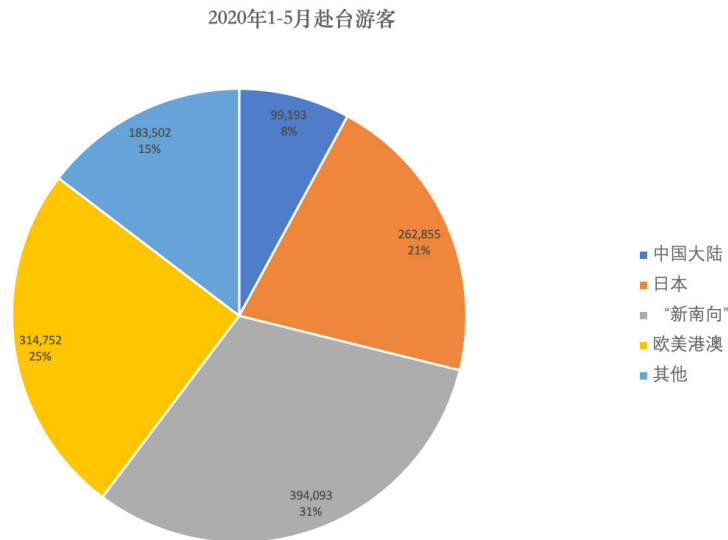


图2 2020年1-5月赴台游客人次及占比

数据来源：台湾交通主管部门观光局观光统计资料库，<https://stat.taiwan.net.tw>，访问时间：2020年7月31日

#### 四、反分裂斗争的国家认同构建

针对分裂势力通过在政治认同层面构建政治意识上的差异与对立和文化认同层面上的“去中国化”、割裂两地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反对融合发展以弱化甚至颠覆国家认同的做法，大陆方面应该思考如何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并将其在可预见的未来成功的运用于台湾地区，如何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探讨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明确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既要充分扩大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也要坚定共同的价值理念，以凝聚价值共识，促进思想精神的团结，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与和平发展。

##### （一）反分裂的法律建设

法律作为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国家稳定，保证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强有力武器，也是反对与遏制分裂主义，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坚实保障。

2005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为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维持台湾海峡的稳定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面对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台独”势力的不断挑衅和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我们更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到《反分裂国家法》的重大价值，在反“台独”的斗争中不断加强法律建设。基于此，一是要充分发挥《反分裂国家法》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审时度势。2005年，面对民进党当局妄图利用“修宪”和“立法”形式，通过“公民投票”、“宪政改造”等手段加紧推进所谓“法理台独”分裂活动，中央政府果断制定并公布实施《反分裂国家法》，岛内“台独”气焰受到沉重打击。<sup>[26]</sup>当前，蔡英文当局否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的政治基础，还采取一系列“去中国化”的做法，推进“渐进台独”；同时，利用香港事态妖魔化“一国两制”，并勾连外部势力。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必须要根据《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关规定，认真研判局势发展状况，防患未然。二是要积极地调动台湾同胞了解和支持《反



分裂国家法》的热情,在此基础上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实现两岸融合发展。最后,立足于新时代进一步贯彻落实《反分裂国家法》,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香港地区,“港独”的肆虐、反对势力对香港的“揽炒”、“修例风波”的发生以及外部势力深度介入香港事务等,凸显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也凸显了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sup>[27]</sup>2020年6月30日,第十三届人大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下文简称《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是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重大举措。<sup>[28]</sup>为更好地实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需要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共同努力,做到依法保证该法律在港区的执行,并适时地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以确保香港特区和内地的安全与稳定。此外,在该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在确保香港地区高度自治的同时,实现香港和内地在国家安全法层面的契合以及相关执法部门之间的必要的合作,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港的顺利推进,提升反分裂斗争的法律建设能力,维护国家安全起到应有的作用。

## (二) 政治和文化认同建设

加强政治和文化认同建设是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紧迫任务。

在政治认同层面,对港台地区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的过程中,要坚定在“一国”的框架下进行统筹,即以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只有坚持了“一国”,才有“两制”可言。香港回归之后,还有很深的殖民统治的烙印,同内地之间也存在梳理和隔阂,因此并不会主动地向内地靠拢,这就需要内地的积极引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凝聚两地共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实现香港内地多元包容的政治意识并存。而在台湾地区,“台独”实质上是通过制造政治意识的对立来鼓吹“两国论”,因此中央政府更应该凝聚国家统一的共识,坚定制度自信,充分展现制度优势让台湾民众共享发展红利,从而赢得认同。

从国家文化认同建设的角度来说,不但要加强民族及本土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交融,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凝聚价值共识。文化认同的构建也需要国家主体文化的引领,通过主体文化强大的吸引力,使得民族本土文化在保留自己独特性的基础上也吸收了主体文化的价值观念。因此,国家主体文化需要具有更加包容开放的特性,来应对分裂势力所造成的文化隔离。在港台地区,要继续坚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即在坚持同属中华民族的前提下,以包容的胸襟尊重港台地区各自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的某种多元性,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 (三) 教育与交流建设

在反分裂斗争中,青年群体的认同建构愈来愈成为一个需要现实考量的问题。进入新时代,青年一代成为了对港台工作的重点对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明确指出:“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sup>[29]</sup>在台湾地区,由于世代的更迭,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必然在不断地取代同大陆有渊源联系的台湾人而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加之由于台湾当局歪曲的历史建构和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强调,使得台湾青年将祖国大陆认同约等于对独裁专制的认同,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念,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对民族和国家认同。在这些价值观建构下,台湾青年的本土意识也愈发强烈,“台

湾人”而非“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也在逐渐烙下印记。而就香港而言，西化价值观的熏陶和“无历史”的教育成为了影响认同的主要原因。因此，学校作为重要的政治社会化的场所，中央和特区政府必须对学校教育予以重视，对教材进行全面整顿。对于分裂势力传播的“独立”、“反中”、“仇共”等必须通过法律予以制裁和遏制。采用教育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塑造和引导青年一代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与此同时，网络等新媒体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青年群体正是主力军，因此，国家也需要运用网络等新的传播媒介以青年一代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工作。

## 结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其中国家统一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为此反分裂也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大课题。在反分裂斗争中，国家认同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层面，即政治意识的对立和主体文化的缺失共同导致了部分香港民众和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分裂势力通过建构政治意识上的矛盾和对立和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并且割裂两地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反对融合发展来弱化民众的国家认同。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一国两制”政策的基础上，以青年一代为重点，充分展现制度优越性以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同时在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时，要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尊重民族本土文化的多元性，相互借鉴，凝聚共识。

### 注释：

- [1] 李捷：《反分裂斗争中的认同政治：价值与制度视角》，《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66-74页。
- [2] 李捷、张露：《论国家统一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26-36页。
- [3]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22-46页。
- [4] 曹伟：《反分裂视角下的“中华民族认同”建设》，《原道》，2015年第2期，第83-105页。
- [5] 石勇：《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的三维审视》，《台湾研究》，2019年第3期，第45-52页。
- [6] 曾志敏、宁悦：《香港青年对内地的社会心理：演变历程与建构路径》，《台港澳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第97-104页。
- [7] 王晓笛：《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与管治机制变迁——以国家基础性权力为视角》，《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64-71页。
- [8] 关于政治意识的详细解释，可参见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 [9] 有关政治体系的详细概念，可参见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 [10] 赵海立：《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42-48页。
- [11] 方旭光：《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2006年，第204-205页。
- [12] Inglehart, R. and Abramson, P. Measuring Post-materi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3, 1999, p.665-677.
- [13]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论述，可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 [14] 孙国东：《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根本法则》，《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72-83页。
- [15] 李捷：《全球化与分裂主义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3期，第23页。
- [16] 赵浚、陈祉杉：《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及其化解途径》，《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63页。
- [17] 陈云：《香港城邦论》，香港：天窗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

- [18] 史明：《“台湾独立”的理论与实际》，高雄：南冠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 [19] 陈孔立：《台湾建构“台湾民族文化”的典型话语批判》，《台海研究》，2020年第2期，第1页。
- [20]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页。
- [21] 陈孔立：《“台独史观”的建构与严重影响》，《台湾研究》，2018年第5期，第2页。
- [22] 郑钦仁：《生死存亡年代的台湾》，台北：稻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 [23] 阎小骏：《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 [24] A Statistical Review of Hong Kong Tourism 2019(2019),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Retrieved July 31, 2020, from <https://securepartnernet.hktb.com/filemanager/intranet/ir/ResearchStatistics/paper/Stat-Review/StatReview2019/Statistical%20Review%202019.pdf>
- [25] 李文成、陈先才：《蔡英文连任与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2期，第38页。
- [26] 严峻：《进一步发挥〈反分裂国家法〉的作用》，《两岸关系》，2020年第6期，第16页。
- [27] 张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内外因素链接与互动效应》，《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77页。
- [28] 郭天武、吕嘉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探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83页。
- [29] 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11/06/c\\_138532143.htm](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11/06/c_138532143.htm)，2020-02-29。

(责任编辑 刘佳雁)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Anti-Separatist Struggle—Hong Kong and Taiwan case studies

### Zhang Jian & Bao Yuting

**Abstrac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National reun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fforts to modernize it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In the combating separatist struggle, nation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identity.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that affects political identity. In terms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ain culture and sub-national culture have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e opposition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lack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main body together lead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in some Hong Kong people and Taiwan people.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Hong Kong Independence" forces weaken or even subvert the national identity by constructing opposition i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de-sinicization" in culture, severing the historical tie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and oppos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on the one hand, fully demonstrat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institutional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 main culture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value consensus and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Anti-Separatist;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Hong Kong Independence"; "Taiwan Independence"